

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自身,都亟须中华文化的转化与创新。

参与这一伟大事业的个体和群体,思想观念要到位,知识结构要调整,要“扩容”,举步措施要得当,落实行动要扎实,相关的体制、机制要改革,协同创新要推进。

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五周年之际,“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”在京召开“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”学术研讨会,是一次重要的纪念活动、学术活动,也是对协同创新中心下一步工作进行研究和安排的活动,这对山东省乃至全国儒学界协同、合力,创新性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将产生很大影响和促进作用。

习近平总书记五年前视察曲阜,并发出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号召,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,世界正在出现前所未有的巨大调整、动荡、变革的关键时刻的一个重大事件,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。

人类正站在又一个十字路口。此时,世界上像南美洲那样,茫茫然不知南行还是北去者众,正需要中国智慧;国人方向已定,但是一时不知如何找到兴旺之法的人也有,这也需要从前人的经验和教诲中汲取适合于今的思想而发展之,超越之,形成民族共识,自觉而自信地昂然走在新格局下的道路上。因此,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自身,都亟须中华文化的转化与创新。

对中华文化的主干儒学,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,说难也难,说不难也不难。儒家学说从孔孟开始奠定了的基础出发,2000多年来,实际上已经历了多次重大转化和创新,甚至可以说,一部儒学发展史,就是儒家思想不断丰富提高、超越自身、适应发展变化的时代与现实的历程,前哲的精神和经验已为我们“导夫先路”。从20世纪中叶起,中国的社会结构、教育水平、科学成果、文化自觉,特别是政治制度,和20世纪前半叶以及全部过往有了本质上的不同。当下,以继承、发展儒学,为文明相融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学人,我们心急如焚,是理所当然的,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,“任重道远”的古训也在提醒我们:既要全力以赴,又要切近急骤;既要大胆创新,又要牢记根本。为把这一想法说得清楚些,我简要地提出以下几点意见,谨供“中心”和同道们参考。

一是要必须站在为人民、为天下、为人类未来的高度有所思、有所为,就是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出发点 and 指南。

二是要跳出儒学看儒学,跳出中国看儒学,跳出人文社会科学看儒学。这是先圣先哲开辟的不断实践探索之路,接力的火炬传到当代,我们理应视野更开阔,方法更科学,跑得更有力量,更迅捷。

三是要达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“讲清楚”,让它“活起来”,这应该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,唯有如此,也才能与儒学界人士学习、研究的初衷相吻合。为此,我们自己首先要研究清楚,要在自己心里活起来,学习、研究者主体与所研究的客体相合一。“知行合一”在儒学学习、研究、转化和创新过程中尤为成败、优劣的关键。

四是要高度重视一代代年轻学者的培养,勇于改革创新培养年轻人的体制和机制。

五是要挽救即将淹没的“绝学”。这里所说的“绝学”,特指原先被列为“经学之附庸”的“小学”,包括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校勘、版本、典章制度等等。这些都是让文化遗产明白、讲清楚、活起来的基础、前提和工具。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,夫子之教也。

上述几点,概而言之,不过就是想强调:参与这一伟大事业的个体和群体,思想观念要到位,知识结构要调整,要“扩容”,举步措施要得当,落实行动要扎实,相关的体制、机制要改革,协同创新要推进。“知易行难”,其实知也不易,包括知“其然”和“所以然”都需下一番苦功夫;而欲明其深邃内蕴,化为内在,从而具备身体力行“行”之能力,确实更“难”,特别是在大的格局发生巨变时,尤难!

# 让中华传统文化『活起来』

许嘉璐



## 碎金留影 树树繁花

——中国古文字研究40年回眸

何景成

文字,指出了这段文字与同墓出土的二十八宿图之间的关系,认为曾侯乙可能是楚国的乐官。妇好墓发掘以来,卜辞的断代研究十分活跃,而殷墟小屯南地甲骨的发掘又为卜辞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。前几次年会,甲骨的断代一直是讨论的焦点。当时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古文研究室李学勤、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裘锡圭主张“历组卜辞”属于武丁时期,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邹英、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陈炜湛则赞成“历组卜辞”属于武乙、文丁时期,大家各抒己见,精彩纷呈。在年会的热烈讨论中,古文字研究的活跃局面开始形成。

### 多元培养,后继有人

1978年伊始,在国家教育政策推动下,一些有条件的高等院校,如北京大学、吉林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四川大学等,开始恢复招收古文字学方向研究生,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。在于省吾、容庚、胡厚宣、徐中舒等研究会元老的悉心指导下,年轻学者迅速成长起来,成为古文字研究的新鲜力量。除了培养研究生,研究会的理事还通过举办培训班的方式,培养专业人才。1984年,在教育部的统一规划下,吉林大学于省吾教授承担了古文字培训班的教学工作,开设说文解字、甲骨文研究、金文研究、战国文字研究等专题课,培训出一批古文字学专门人才。

进入新世纪,古文字学科在人才培养上开创了多家单位协同培养的模式,强化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培育。2012年,国家推行“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”(2011计划)。清华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吉林大学、中山大学等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单位,联合组建“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”协同创新中心,并于2014年入选“2011”计划。协同中心以“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,培养优秀的复合型拔尖人才”为建设目标,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,采取学术论坛、交流班、访问研究、学术考察等多元培养方式,全方位提高了古文字学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学术水平与创新能力。

古文字研究所有的学问都是开放的,今天的结论明天就会因为新材料的出现而有所改变,年轻学者一旦进入这个象牙塔,付出的将是一生的痴迷,得到的也是一生的快乐。

### 夯实根基,完善体系

1978年—1982年,由郭沫若主编、胡厚宣担任总编辑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负责编辑的《甲骨文合集》陆续出版齐备。《甲骨文合集》收录了自甲骨文发现80年来已著录和未著录的殷墟甲骨拓片、照片和摹本4万余片。基本收齐当时已有的甲骨文资料,为甲

骨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1984—1994年,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《殷周金文集成》陆续出版齐全。全书对商代到战国时期的各类有铭铜器系统整理、分类辑录,为金文研究提供了完备的资料基础。它们的构建,甲骨文字研究方面,饶宗颐启动《甲骨文通检》撰写,姚孝遂和赵诚主持编撰《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》和《殷墟甲骨刻辞类纂》,于省吾主编《甲骨文诂林》。学界出版了不同类型的大甲文字编,如《甲文编》《新甲文编》《甲文文字编》等。金文研究方面,《金文编》经修订增补后重版,《殷周金文集成引得》《金文形式通解》等大型工具书亦编辑出版。目前,通过编撰各类大型工具书,古文字学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数据体系,为各学科提供了中国古典时期丰富的语料和史料。

历经40年发展,古文字学学科形成了甲骨学、金文学、战国文字学和简帛学等完善的学科体系。作为学科基础的古文字释读,在理论和方法上均颇有建树,许多疑难文字得到正确释读,完善了古老汉字的发展序列。在甲骨学领域,建立了甲骨文分类与断代研究的完整体系,为甲骨文字考释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。金文研究中,各诸侯国青铜器铭文的发现与研究,深化了人们对周代国家结构和地域文化的认知。战国文字分域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,揭示了战国时期各国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和交融性。

### 寓古于新,传承有序

王国维总结学术史时说:“古来新学问之起,大都由于新发现。”新出土新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对于古文字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。

1991年,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殷墟花园庄东地发掘了一个甲骨文坑,坑内出土刻辞甲骨近700片,且以大块的和完整的卜甲居多,这是殷墟甲骨文的第三次重大发现,备受学界瞩目。这批资料因占卜主体是“子”而称为“花园庄卜辞”,是殷代贵族家族占卜资料的重大发现,对深刻了解殷代的社会结构有重要价值,新资料所揭示的新字形、新辞例,大大促进了甲骨学的发展。

1998年,《郭店楚墓竹简》一书出版,公布



了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一号楚墓所出土的700多枚竹简资料。这些楚简包含多种古籍,重要篇章有《老子》《五行》《缁衣》等,宛如打开一座古代的图书馆。郭店竹简的公布,揭开了古书类竹简大发现的序幕。中国古文字研究由此迈入一个新阶段,开辟了依据出土古书实物开展中国古典学研究的新领域。简帛研究成为古文字研究的新热点,激发了境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,渐成国际显学。

2008年,古文字研究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在吉林大学召开,当时恰逢清华大学自香港购回一批战国竹简,“清华简”成为与会学者热议的话题。数量近2500枚的“清华简”多为经、史一类典籍,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,价值不可估量。清华大学专门成立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,凝聚各学科专门人才,整理、保护和研究这批竹简。该中心自2011年开始,以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为名,一年一辑陆续出版研究成果,前不久刚刚出版发布了第八辑的研究成果,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持续关注,对历史学、考古学、古文字学、文献学等学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

在古文字研究者的努力下,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学术课题的攻关,古文字研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,为古史重建和古典学重建,为正确估价中国古代文明,提供了丰厚的学术支持。

120年前的1899年,甲骨文的偶然发现掀开了中国文字研究及中国学术的新篇章,直到今天,无数人依然在这一领域精耕细作。2016年5月17日,习近平总书记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,指出“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,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,要重视这些学科,确保有人做、有传承。”改革开放以来,正是在党和国家的支持帮助下,古文字学才实现了良好的传承与创新性的发展。

经过40年的建设和发展,古文字研究已经彻底扭转了研究会成立时期较为困窘的状况。源源不断出土的新资料、新技术的吸收与应用,年轻学者的不断培养,都使古文字研究会保持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,不断推动着中国古文字学的发展。

制图:郭祥



## 一件北魏彩画漆屏风的价值

胡闻博

有这寥寥百余字,不过作为同北魏联姻的西晋后裔、声名显赫的中原世家贵族的代表,他所留下的文化遗存,自然对研究这一时期北魏社会的汉化过程具有特殊意义。

东晋以后,漆器制品很少见,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彩画漆屏风显得尤其珍贵。漆画木板,应为漆木屏风的构件,出土较为完整的有5块,边框5件,木档3件,还有部分画的残片。每件漆画均长约80厘米,宽约20厘米,厚约2.5厘米,上下、两侧均有榫卯,可拆可合,属于一个巨大漆屏风的一部分。木板屏正面、背面均绘有漆画,人葬时朝朝下的一面腐蚀严重,难以辨识,幸亏向上一面保存比较好。

专家认为,这件漆画非同一般意义上的髹漆工艺,与同时期宁夏固原出土的北魏漆棺画相似。以柏木做板材,先以织物类贴敷做漆灰地,遍髹朱地,然后以黄、白、青绿、橙红、灰蓝等矿物颜色用油调和作画,这是一种“描漆”技法。在描写的物象上,线条轮廓主要用黑漆勾成,墨笔勾眉目,人物肤色涂铅白。这些特点都为研究南北朝时期的髹漆工艺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。

观众看到的这幅漆画的构图分为上下4层,每层均有单独主题,配以墨书题记和榜题,来标示人物身份和说明内容。第一层的图分别是虞舜二妃、舜父瞽叟与象数填井、舜

后母烧虞,这一层只有榜题无题记。第二幅周室三母,题记4行;第三幅鲁师春姜与春姜女,题记6行;第四幅班姬辞辇,题记4行。漆画所绘故事内容是汉朝以来屏风画的传统题材,体现了墓主生前意识中对中原传统文化与伦理观念的尊崇。

漆画中人物宽阔的袖口、鱼尾状拖地的裙摆,飘举的衣带,无不表现出仪态雍然、雍容华贵的气质。在汉代单勾线和大笔平涂的基础上采用的铁线描,笔触干净利落,流畅准确。学者认为其画风、与东晋名画家顾恺之十分相似,如“春蚕吐丝”“吴带当风”。它的绘画风格、技法、设色富有强烈的时代特征,对研究北魏前期的绘画风格,进而探讨整个魏晋时期的中国绘画成就有独到的价值。

漆画上有大片墨书的题榜文字,墨书笔画方严劲挺,结字方正宽博,浸润着南朝文人的书法意趣,具有舒展、刚健的特色,接近楷书;但有的字尚带有隶书遗风。漆屏上的书法正处于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阶段,是不可多见的北魏书法真迹。

四件柱座也是国宝级文物,可能用于插屏风或帐幔。柱座为鼓状覆盆形,方形底座,顶部有圆形插孔,底座及柱座表面浮雕精美的纹饰,有饱满的双莲瓣,还有首尾相衔仿若穿梭在汹涌波涛中的蛟龙。柱座底座四角还

圆雕有四个姿态各异的乐人,或击鼓,或弹五弦琵琶,或吹笙簧,或翩然起舞,线条流畅,表情生动。整体造型精致华丽,体现了北魏豪迈磅礴的时代特色。

司马金龙墓是他与妻子姬辰的合葬墓。1965年由大同市博物馆抢救性发掘,因为有明确的墓志表而得以确认。该墓的形制和室内布置,继承了魏晋时期中原地区的传统,和同时期南朝上层统治阶级的墓葬基本一致,表明了当时中国南北方文化上的紧密联系。但在大规模的随葬品中,出现了大量的甲骑具装备,显示出游牧经济和北方民族军队的特色。一些陶俑的面貌特征,可能是当时居住在大同一带的少数民族的形象。还有一些文物如青瓷唾盂、石砚台、漆食盒等,则具有中原封建士大夫阶层日常生活的典型特征,加上这件精致的彩画漆屏风,足够探讨当时的中原传统世家在归附北魏政权后的种种文化选择。

## 寻古探源

